

奇哥娜·邊界·階級 墨美女性 書寫中的性別、種族與階級意識

黃心雅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E-Mail: t1832@nknucc.nknu.edu.tw

摘要

本論文以種族、性別與階級三者串連所形塑「統合之見」為基軸，鋪陳奇哥娜經驗，以輝映種族、性別、階級交切議題，闡釋墨美女性身為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少數民族以及弱勢女性的特殊經驗，以安莎杜娃的《邊境》與卡絲狄洛的《如此遠離上帝》兩部奇哥娜書寫代表作品為分析文本，探討性別、種族以及階級互為形塑、辯證的關係，闡釋「差異」物質化的概念，意識型態是物質實踐，「論述」具物質性，差異以物質實踐形式展現，涉及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權力運作，意識型態不再是理念，而是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實踐，展演歷史與社會的特殊性，從墨美邊界女人的日日勞務中，論證性別、種族、國家以及階級密不可分關連。

關鍵詞：邊界、差異政治、階級、交切、統合之見

壹、前言

本論文擬由奇哥娜 (Chicana)¹ / 墨美女性族裔文化反思「階級」(class)，將墨美女性、族裔邊界文化與奇哥娜勞工階級意識串連，彷彿連續體 (continuum)，形塑墨美性別、種族與階級之「統合知見」(totalizing view)，抗拒父系霸權、殖民／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形構的「宰制／從屬矩陣」(matrix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論文從奇哥娜文化出發，以「奇哥娜」特指墨美族裔女性文化經驗，為「奇哥諾」(Chicano) 之陰性，是近年墨美族裔抗爭文化 (oppositional culture) 生產之族裔認同詞彙，用以辨識「族裔、國族個體與立場，對抗美國白人文化、社會霸權的同化與宰制」(Saldívar, 1990: 13)。² 以 Chicano/Chicana 指稱美國西南部橫越墨美邊界的阿茲特蘭 (Aztlán) 住民，混雜阿茲特克族原住民、西班牙、盎格魯及非裔美洲血統，墨美作家以 Chicano/a 自況，將邊界經驗 (border experience) 入書，強調邊界混血意識 (mestiza consciousness) 及後殖民抗爭文化，非「西美」(Spanish-American) 或「墨美」(Mexican-American) 等詞彙所能描繪 (Phelan, 1994: 65)。

本論文專注於奇哥娜族裔經驗，墨美文化研究學者沙緹巴—胡 (Sonia Saldívar-Hull) 即認為墨美族裔女性的歷史與文化經驗足以形構「解放模式」(model for liberation)，挑戰後殖民、馬克思與女性主義論述的正當性，以其「特殊的種族、性別與階級剝削的歷史」質詰文化論述議題單一化的合法性，奇哥娜特殊歷史文化經驗跨越

¹ 「奇哥娜」一詞為學者梁一萍之中譯，參見〈邊界敘事：奇哥娜作家邊界書寫〉(2003)，梁文以希克絲 (Emily Hicks) 的「邊界書寫」(border writing) 為論述依據，說明奇哥娜作家以跨界挑戰霸權，是為奇哥娜書寫的邊界主義之精髓。

² 除「奇哥諾／娜」外，墨美族裔或稱 Mexicans，標舉墨美地理相連，慣用於德州南部邊界地區；或稱 Hispano/a，則強調與歐洲殖民結構文化、語言的雜混，常用於新墨西哥州與南科羅拉多州，兩者為近年的「奇哥諾／娜國族運動」(Chicano Movement) 所摒棄，有關「奇哥諾／娜國族運動」見論文以下論述。

族裔、性別、階級議題單一類檔 (category)，以其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重新導引文化論述，進而發展統整的覺知 (holistic awareness)，矯治後殖民、馬克思與女性主義論述將種族、階級與性／別簡化為單一類檔的謬誤，匡正當代文化研究忽略族裔認同政治中種族、階級與性／別交切形構的特殊族裔經驗的缺失 (Saldivar-Hull, 2000)。

本論文即以種族、性別與階級三者串連所形塑「統合之見」(totalizing view) 為基軸，鋪陳奇哥娜經驗，以輝映種族、性別、階級交切議題，闡釋墨美女性身為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少數民族以及弱勢女性的特殊經驗，如何成就其族裔救贖的文本。奇哥娜女性文學作品中實展現性別、種族、文化以及階級要素的融合，安莎杜娃 (Gloria Anzaldúa) 稱之為「一個比較完整的視角」(a more whole perspective)。³ 論文以安莎杜娃的《邊境》(*Borderlands/La Frontera*) (Anzaldúa, 1999) 與卡絲狄洛 (Ana Castillo) 的《如此遠離上帝》(*So Far From God*) (Castillo, 1994) 兩部奇哥娜書寫代表作品為分析文本，探討性別、種族以及階級互為形塑、辯證的關係，闡釋「差異」物質化的概念 (difference is material)，意識型態 (ideology) 是物質實踐 (material practice)，「論述」具物質性 (materiality of discourse)，差異以物質實踐形式展現，涉及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權力運作，意識型態不再是理念 (idea)，而是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實踐，展演歷史與社會的特殊性，從墨美邊界女人的日日勞務中，論證性別、種族、國家以及階級密不可分的牽連，由性別、種族以及階級差異的罅隙間生產如安莎杜娃所說的「奇哥娜、德哈娜、勞工階級」(“Chicana, tejana, working-class”) 的邊界主體認同。

論文為四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由後馬克思主義批評論述出發，

³ 安莎杜娃是國際知名的墨美 (女性主義) 文化理論家、深具獨創性的作家及學者，於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六日因糖尿病相關併發症辭世，享年六十一歲。

結合後殖民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關懷，形構種族、性別、階級議題交切的理論基模；第二部分探討奇哥娜／墨美族裔女性經驗如何輝映種族、性別、階級交切議題，在現今「後學」當道、理論分裂益顯捉襟見肘之際，族裔經驗 (ethnic experience) 所展現能量乃為知識生產 (knowledge production) 之所仰賴；第三部分則由奇哥娜總述轉入安莎杜娃自傳作品《邊境》中邊界女人 (border woman) 以及卡絲狄洛小說《如此遠離上帝》中墨美勞動女性與土地暴力、資本主義及邊境殖民主業抗爭的特殊族裔經驗。安莎杜娃專注於土地剝削；卡絲狄洛著眼勞工的病痛苦難，土地 (land) 與勞動 (labor) 含納於邊界殖民暴力操控，套用安莎杜娃的話，更突顯奇哥娜「在自己的家鄉上被殖民」的困境。第四部分為結論，以種族、性別、階級議題交切，形塑「解放模式」作結。

貳、種族、性別、階級交切

文化論者霍爾 (Stuart Hall) 基於文化認同的形塑與社會發展的連鎖效應，將文化認同的形成劃分為三個階段：(一)「啟蒙主體」：與啟蒙時期個人主導思想緊扣，認為主體為一完整中心，擁有清晰、自我確立的行動能力與理性智慧，是一統合的整體 (unified whole)；(二)「社會主體」：現代主義之起，工業社會將個人依階級、性別、族裔等身分類檔加以區分，從而引申相關社群關係網路，文化認同依據與其他「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 互為影響而確立；(三)「後現代主體」：強調身分的不斷創造與建構，文化認同的「生產」(production) 是持續進行的過程，認同只有由特定的歷史與空間中解讀 (Hall, 1997: 110)。由現代主義社會主體過渡至後現代主義主體性之論證說明後期資本主義 (late capitalism) 的文化邏輯，也是本文討論種族、性別、階級交切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 的起點。馬克思主義走向後現代道路的後馬克思主義，⁴ 不再以階級單一類檔解釋文化認同，相對地，主體建構超越單一類檔。莫斐 (Chantal Mouffe) 即認為，在社會體系中，每一個社會個體 (social agent) 皆被銘刻於複雜多重的社會關係中—非僅涵蓋生產關係，同時也包括性別、種族、國民性以及近鄰等關係；這些社會關係決定了主體的地位，不能簡化至單一關係，生產關係的勞動階層者同時也是男人／女人、白人／黑人等等，個人的主體性並非僅建構於生產關係中的位置而已。更進一步說明，從七〇年代興起的新興社會運動，如都市、生態、反核、反官僚、反種族歧視、女性主義等所表現的敵意，乃是對西方霸權結構的反撲，西方帝國霸權優勢夾帶資本主義，使社會生活商品化，造成新臣屬形式，激發少數族群／團體起身抗拒，以己身語言、文化領域裡的特殊性，重新肯定「差異」，由不同的階級、性別、族群經驗發聲，抗拒資本主義的單一化、殖民化、僵化，建構「多元」主體。因此，據莫斐分析，新興社會運動即強調一種自主的民主團體，以具批判性的文化為力量泉源，透過不同議題的串連，對資本主義造成的文化「單一化」進行抗爭；主體認同不斷創造與建構，經由自身的語言與位置的差異特殊性，重新含納已然被弭平的「不同」，找到多元的主體認同 (Mouffe, 1988: 90-91)。

莫斐的分析主線是由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有關文化霸

⁴ 有關「後馬克思主義」一詞的用法，傅偉勳認為有廣狹三義：(一) 廣義而言，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後所有試圖繼承發展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圈內理論與直接或間接受過古典馬克思主義影響但非屬馬克思主義系統的圈外學說，皆屬之；(二) 戰後 (尤指越戰結束後) 產生的一些受馬克思主義啟發但又批判揚棄馬克思主義的新派非馬克思主義學說，如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的新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 即是典型代表；(三) 為往後走向後現代化道路提供理論基礎，足以批判性地超越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死硬對立的可能理論，為未來政治社會 (批判) 理論提供一種現代化觀點者，即屬之 (傅偉勳, 1987: 51)。本文所稱後馬克思主義則屬前述第三義。

權 (hegemony) 的概念為起點，在現實上受到以族群、生態與性別為主的新興社會運動影響，在理論上又有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 論點的刺激 (Mouffe & Laclau, 1994)，馬克思原有的二元辯證架構不足解釋社會各種力量競逐的多元實況，借用阿馬力格利歐 (Jack L. Amariglio) 等人的話來說，即是社會形構與文化生產已無法取決於單一過程，「階級」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其複雜的意涵則仰賴「階級」與其他社會過程 (social processes) 不斷的互動而生產 (Amariglio, Resnick, & Wolff, 1988: 487-488)。

莫斐等人的論點點出了階級與性別、種族等不同界域交切的事實，其「多元」的批判論述，與得路司 (Gilles Deleuze) 以及瓜得利 (Feliz Guattari) 的「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 若合符節，得路司與瓜得利在《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 (Deleuze & Guattari, 1983) 一書中，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伊底帕斯」，視其權力運作為「伊底帕斯化」，形塑單一、排他的霸權；相反的，「精神分裂分析」強調多元化，不干預性別差異、不凸顯種族純粹性，人人皆為慾望機器 (desiring machine)，隨慾流動，慾望絕非單一、整體，「精神分裂分析」故而消弭同質性，開展多元與多音。但是，這樣的「精神分裂」批判模式雖點出了階級中不同性別、種族、界域的事實，卻忽視了父系霸權、殖民／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共謀所形構的「宰制矩陣」，解構了性別、種族與階級的關連，失落了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串連與辯證所能展現的「統合知見」。這也是文化研究論者探討種族、性別與階級交切議題經常面臨的窘境。

首先，種族、性別與階級交切之「三重壓迫」(triple oppression) 議題最早為少數族裔／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研究學者提出，以描繪有色人種女性面對殖民主義、父系霸權與資本主義多重壓迫的困境 (Segura, 1991: 47)。例如，一九七九年米蘭得 (Alfredo Mirandé) 與

安利戈斯 (Evangelina Enríquez) 即以「三重壓迫」說明墨美族裔特殊殖民處境 (*La Chicana*)；一九八一年戴維斯 (Angela Davis) 以「三重壓迫」架構分析黑人女性社會文化權力結構的劣勢 (Davis, 1981)；一九八四年巴湯利 (Gill Bottomley) 等人合書的《澳洲族裔性、階級與性別》(*Ethnicity, Class and Gender in Australia*)；嗣後一九九一年同組人馬又出版通論選集《交切：性別／階級／文化／族裔性》(*Intersexions: Gender/Class/Culture/ Ethnicity*)；一九八九年著名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施芭 (Vandana Shiva) 同樣以「三重壓迫」之論闡釋第三世界女性與生態所受的伐害；而以默韓蒂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為首的九〇年代第三世界主義女性主義，以「殖民主義、性別、階級」多元詮釋帝國、階級及父系文化的「統治關係」(relations of ruling)。⁵ 默韓蒂挪用社會學家史密斯 (Dorothy Smith) 「統治關係」之語彙，說明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議題的多元交切，認為宰制系統乃透過如史密斯所言的「特定歷史」的「統治關係」予以實踐與操作，女性主義政治大力借用社會學論述，史密斯以「統治關係」詮釋父權文化與資本主義多重權力場域交切牽制，默韓蒂則以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視角加上種族的面向，強調種族主義、資本主義、性別主義權力結構的多重交切，父系霸權及殖民主

⁵ 感謝論文審查學者的寶貴意見，提示默韓蒂由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論述出發，串連種族、階級、經濟、社會與環境正義等議題的重要貢獻，默氏在一九九一年與胡索 (Ann Russo) 以及陀倫 (Lourdes Torres) 等人編纂《第三世界女人與女性主義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一書，默韓蒂在該書的導論中，即挪用社會學家史密斯 (Dorothy Smith) 「統治關係」的語彙，說明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議題的多元交切 (Mohanty, 1991: 1-50)。默韓蒂自一九八〇年代從事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研究，歷經二十餘載的深耕，於二〇〇三年出版專書《無疆界女性主義》(*Feminism without Borders*)，由該一九九一年導論延伸，試圖建構實踐「跨疆越界」的女性主義結盟 (feminist solidarity) 之藍圖，深受奇歌娜邊境文化、社會、歷史經驗尤其是安莎度娃之作的啟發 (Mohanty, 2003: 76-82)。其他七〇及八〇年代以降，女性主義相關的種族、性別、階級 (及至情慾) 多元交切論述，參見 Mohanty (2003: 4-5)。

義與資本主義統治機器 (capitalist ruling apparatus) 實無二致 (Mohanty, 2003: 58-59)。

事實上，八〇年代多元文化教育之興，社會學家首先注意到階級論述融入性別、族裔議題的重要性，誘發多元文化科際整合研究的動力 (McLaren, 1999)，及至一九九三年貝克 (Jean Belkhir) 創辦《種族、性別與階級》(*Race, Sex & Class*) 期刊，三股政治社會研究勢力匯流，形塑新的社會科學研究導向，成為回應批判主流女性主義忽略種族、階級面向；種族論述輕忽性別、階級考量；馬克思主義專注階級鬥爭的新興學術導向 (Gimenez, 2001: 23)。貝克在一九九四年第二卷第一期《種族、性別與階級》〈序文〉中明確指陳：「馬克思主義的潰敗在於無法提出探討族裔、性別與階級議題的完整理論和適當研究工具」；「探索種族、性別與階級主義 (racism, sexism and classism) 的分析工具 (analytical tools)，於今則益顯迫切」(Belkhir, 1994: 79)。

至此，值「交切」(intersection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 成為文化論述主軸，「分析工具」之方法論則仍待思索，學者的「交切」隱喻語彙不可勝數：triple oppression, interplay, interrelation, cumulative effects, interconnections; interactive, triadic relation, overlapping, interactive systems, multiple jeopardy, multiplicative, simultaneous, inter-connected systems of a whole, interlocking, intersexion, intersection 等 (Belkhir, Vanfossen, & Berry, 1995)，愈發突顯面對「交切」的焦慮，基縵妮思 (Martha E. Gimenez) 因而質疑交切的平台、基模何在 (Gimenez, 2001: 29)？基縵妮思認為「交切論述」應回歸馬克思主義所謂個體乃是「多種社會關係總合」(an 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 (Gimenez, 2001: 224) 之論：「個人存在於多種不平等社會關係交切核心，而社會關係則契據於定義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模式的相關社會結構」(Gimenez, 2001: 21)。

這種說法與莫斐等人依止於後現代主義的後馬克思論調相對照，其抽象實無二致。

相較之下，卡齡思 (Patricia Hill Collins) 的文化經驗論則更具啓發性。卡齡思指出在種族、階級、性別形構的政經體系中必然存在一種「主宰與從屬的基本關係」(a basic relationship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Collins, 1993: 29)，此一「主宰與從屬的基本關係」貫串種族、階級、性別議題卻無法從單一理論體系解決，需以「實用」(pragmatic) 的視角，視「經驗」(experience) 為知識來源，經驗形塑理論、修正理論的僵化，探討種族、階級、性別交切有必要超越理念與意識型態，從決定意識的存在經驗下手 (Collins, 1993; Collins & Anderson, 1995)。卡齡思之見降低對理論的依賴，著重經驗層面，卻與馬克思主義差異 (difference) 物質性 (material) 的概念不謀而合，卡齡思尤其回歸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突顯「階級」為三者交切研究的原動能 (dynamics)，準此，才足以釐清「主宰與從屬」的基本關係。從馬克思主義立場來看，「階級」概念的性質不同於「種族」與「性別」，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是純然壓迫體系 (system of oppression)，「階級主義」則在「壓迫」面向外更有「促變」的功能 (potential agent of change)，中產階級革命解放封建壓制，推動自由、民主、博愛理念，創造物質財富，促使民主、科學的發展，而今資本主義結合新帝國主義全球性擴散所造成的種族、階級、性別壓迫則有賴勞動階級的再次革命，使竟其功。

交切論述由經驗及差異的物質性下手，同樣也是默韓蒂女性主義政治的重要命題，默氏認為反殖民 (decolonialization)、反資本主義批判 (anticapitalist critique) 與結盟政治 (politics of solidarity) 相輔相成，女性主義思維與社會及經濟正義相連相繫，女性主義願景需涵蓋經濟的穩定、生態的永續、種族的平等以及由人民物質生活基礎所衍生的財富平均分配 (Mohanty, 2003: 1-3)。默氏關注統治

(宰制)的實際操作形式 (practices of ruling) (Mohanty, 2003: 55-56), 對默氏而言, 宰制的實際操作乃以種族、階級、性別等多重抽象類檔, 將自我 (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殖民統治者) 與他者 (非白人、女性、勞工階級、被殖民者) 予以階層分化, 以遂統治之實。默氏解構理論, 由經驗下手, 反向操作, 以「結盟」(solidarity) 瓦解交切宰制, 差異政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s)、結盟政治與經驗政治 (politics of experience) 理應相提並論 (Mohanty, 2003: 106-23)。默韓蒂女性主義經驗政治之論述與卡齡思對經驗層面的重視若合符節, 知識生產無法忽視日常經驗及集體社會與經濟改造的重要性 (Mohanty, 2003: 5-6), 抗拮政治 (politics of resistance) 也因此需落實在女性日常生活經驗之中。經驗、認同與結盟是貫串種族、階級、性別政治的中心要素 (Mohanty, 2003: 9)。默氏注意到世界秩序的邏輯以跨國經濟為宗, 其中涉及種族化／邊緣化的女性勞工, 種族化的女性勞工意象鮮明, 結盟政治以女性勞工為先導 (Mohanty, 2003: 143), 女性主義結盟也因而以反資本主義為標的。默氏二〇〇三年專著《無疆界女性主義》全書第二部分即揭櫫, 反資本主義女性結盟奠基於資本主義宰制下女性勞工之共同利益 (common interests)、歷史位址 (historical location) 及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 等意識型構 (Mohanty, 2003: 139-68)。對抗的論述及實踐、記憶與書寫奠基於日常生活經驗, 生命史的敘述是記憶與載錄經驗與掙扎的重要見證形式 (Mohanty, 2003: 77), 見證／敘述則涵蓋「多重自我」(plurality of self), 默氏引據奇哥娜書寫, 特別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我背為橋》(*The Bridge Called My Back*) 奇哥娜選集, 說明抗拮政治植根於「多重意識」(multiple consciousness) —— 一種集結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性別情慾與階級省思的抗爭 (Mohanty, 2003: 80), 凡此「多重意識」的交融皆源於「奇哥娜 [有色、女性、勞工] 日常生活掙扎的政治與物質性」(the materiality and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 struggles of Chicanas) (Mohanty, 2003: 81)。這種以勞動力為主軸的統合經驗及多重意識，也是當前社會學研究跨國勞動市場的重心，工業化雖史無前例將人類社會結構分化 (structural differentiatedness)，文化政經研究需跨越界限 (fuzzy boundary)，以物質 (階級) 為基礎，激起「促變」之潛能，由不同群體 (性別、種族、移民等) 下手，從事生命史 (life course)、民族誌及口述歷史等的田野經驗調查，才能有統合整體的規模 (Glucksman, 2002)。

綜合上述，本論文對種族、性別、階級交切議題有三項立場說明：(一) 統合 (totality)：在肯定差異、由不同族群、性別、階級發聲、抗拒資本主義以及建構多元主體的同時，需正視帝國主義、父系霸權與資本主義形塑的宰制矩陣，由種族、性別、階級議題串連，展現統合知見；(二) 促變 (change)：解釋形塑種族、性別與階級主義的「基本主宰與從屬關係」時，需彰顯勞動階級性作為促變原動能的效應，在三重壓迫架構裡，突顯 (勞動) 階級性為文化、社會變革的動力；(三) 經驗 (experience)：操作種族、性別、階級交切需以經驗為知識生產的依據，理論的分裂在經驗中跨越界限，達成統合的觀照。

參、奇哥娜、邊界與階級

種族、性別與階級融合串聯的重要性在近來奇哥娜研究中充分體現 (Mirandé & Enríquez, 1979; Moraga, 1983; Anzaldúa, 1990; Blea, 1992; Alarcón, 1996; Córdova et al., 1997; Fowlkes, 1997; Libretti, 1998; Segura & Beatriz, 1999; Chabram-Dernersesian, 1999; Saldivar-Hull, 2000)。由奇哥娜女性主義研究來看，學者沙緹巴—胡指出，奇哥娜具有種族、性別、階級剝削的特殊歷史 (Saldivar-Hull,

2000: 36)，奇哥娜女性主義應由生命經驗 (lived experience) 開展串連性別、階級、種族的女性主義議題 (feminist agenda)，需從物質經驗 (material experience) 著眼，面對奇哥娜女性的經濟困境 (Saldívar-Hull, 2000: 47-48)。⁶ 阿拉恭 (Norma Alarcón) 同樣考量奇哥娜政治地理現實，認為奇哥娜書寫是以文化覺知 (cultural consciousness) 與社會變遷 (social change) 為焦點的自我銘刻 (self-inscription)，「交織奇哥娜主體種族、性別、族裔與階級等矛盾困境」(Alarcón, 1996: 41)。摩拉格 (Cherrie Moraga) 因而質詰激進女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 忽略種族、階級議題的謬誤：女性主義的認同政治應體察「壓迫共時存在」(simultaneity of oppression) 觀念，有色人種婦女所受的階級與種族壓迫和性別宰制一樣熾烈 (Moraga, 1983: 128)。

奇哥娜女性主義由性別議題出發，試圖提示族裔性和階級性的迫切考量，有其全球第三世界女性主義 (Spivak, 1988; Shiva, 1989; Trinh, 1989; Mohanty, 1991; Mohanty, 2003) 與墨美在地奇哥諾國族運動 (Chicano Movement) 脈絡可尋。基於奇哥娜研究關切階級在「三重壓迫」論述中，已是「羸弱環節」(the weak link) 的事實，在此則有必要還原奇哥諾國族運動的面貌，重述「階級」的關鍵位置 (re-positioning class)。

一九六八年奇哥諾國族運動，創造回歸「阿茲特蘭」「原鄉」(Aztlán Homeland) 的國族神話，勾勒奇哥諾／娜人的阿茲特蘭願景，是為「阿茲特蘭精神計畫」。安莎杜娃在《邊境》首章〈家鄉

⁶ Sonia Saldívar-Hull, Norma Alarcón, Gloria Anzaldúa 與 Cherrie Moraga 等奇哥娜女性主義學者在考量多重族裔女性經驗時，於種族、性別、階級三要素外，更加入情慾面向 (sexuality)，揭露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父系霸權與異性戀機制的勾結宰制，本文為集中處理「三重壓迫」辯證關連，將情慾面向略去不談，有關奇哥娜書寫的情慾面向，參考黃心雅 (2003a)。

在阿茲特蘭) (“The Homeland, Aztlán/ El otro México”) 中開宗明義：「我們在此地剛剛建造的另一個墨西哥 (el otro México) 一個位於／本國領土內的家園／努力來自我們所有弟兄／以及懂得追求進步的拉丁美洲人」；「北方的阿茲特克人……組成了今日美國境內所能找到最大的一個安尼西奈貝格 (Anishinabeg) (印地安) 民族……。他們有些自稱為奇哥諾／娜人，是家鄉在阿茲特蘭 [美國西南部] 的民族」(Anzaldúa, 1999: 23)。奇哥諾國族運動精神領袖岡薩里斯 (Rodolfo [Corky] Gonzales) 則以詩明志，〈我是豪津〉(“I am Joaquin”) 訴說：「我們的房子、我們的土地、眉梢的汗珠、我們的心靈——我們自由主宰。阿茲特蘭屬於播種的人、灌溉的人、收成的人，絕不屬於外來的歐洲人，我們不識古銅色大陸上多變的疆界」。於此，奇哥諾國族運動相關要義有二：(一) 回歸原鄉 (quest for a Homeland)：以阿茲特蘭為原鄉，視邊境原鄉為中間地帶 (那華那語所稱的 *Nepantla*)，奇哥那國族主義以其為軸心，去美國 (U. S. A.) 而移向美洲 (the Americas)，場域擴大，遍及美洲洲陸，跨疆越界即為去界 (deterritorialization)，稱美洲為古銅色大陸，彰顯原住民去殖民化、爭回美洲的企圖心；(二) 田野鬥爭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s)：田野土地屬於「播種」、「灌溉」、「收耕」的邊界農工，奇哥諾國族運動由勞工聯盟 (labor organization) 起家，早期團結邊界農工 (farm laborers)，在查北 (César Chavez, 1927-1993) 的號召下，從事農工非暴力抗爭，追溯一八四八年美墨戰後的瓜達魯佩條約 (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其將西南方原屬阿茲特克 (Aztec) 族裔土地劃歸美國，使原住民族裔在自己家鄉被殖民，淪為邊界流浪的農工。⁷ 以農工抗爭為訴求，要回原屬阿茲特克族裔的土地既是奇哥諾國族運動的精髓，奇哥娜研究不僅如雅爾卜荷

⁷ 有關奇哥諾國族運動，參見 Gonzales (1999); NLCC Educational Media (1996)。

(Yvonne Yarbro-Bejarano) 所言，由奇哥娜女性主義出發，實現「墨美女性做為勞工階級少數族裔一員，擔負性別、種族、階級與文化整合融會任務的必要性」(Libretti, 1998: 202)，更需彰顯階級意識團結奇哥諾／娜國族運動的重要，以奇哥諾／娜階級性為「促變原動力」(agent for change)，探索階級性在三重壓迫結構中的關鍵位置。

奇哥諾／娜研究有期刊《阿茲特蘭》(*Aztlan*) 為基軸，相關種族、性別、階級交切之社會學論述已見雛形：《奇哥娜與種族、性別、階級交切》(*La Chicana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Blea, 1992)取奇哥娜社群為樣本，以社會科學之田野調查做勞動力與社會變遷研究，提出具以批判種族、性別和階級主義的「統整研究法」(holistic approach)；《奇哥娜聲音：階級、種族、性別交切》(*Chicana Voices: Intersections of Class, Race, and Gender*) (Córdova, et al., 1997) 則以勞動與政治 (labor and politics) 之辯證，探討奇哥娜新興社會運動中，勞動市場和勞動力的關係及其重要性。文化研究則自一九八七年安莎杜娃《邊境》出版後，奇哥諾／娜研究以邊界論述為主軸，屢有佳作：九〇年沙提巴 (Romón Saldívar) 《奇哥那敘事：差異辯證》(*Chicano Narrative: The Dialectics of Difference*)，以解構主義差異辯證詮釋奇哥那敘事的邊界抗爭；九一年卡德龍 (Héctor Calderón) 與沙笛巴 (José Saldívar) 合編《邊境評論》(*Criticism in the Borderlands: Studies in Chicano Literature, Culture and Ideology*) 指出邊界研究以奇哥那混血勞工階級為主體，結合其他族群論述，形成集體傳記；九三年貝加 (Ruth Bejar) 跨文類、跨學科的邊界研究之作《翻譯女性》(*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同年莫拉 (Pat Mora) 《中間地帶》(*Nepantla: Essays from the Land in the Middle*) 以那華特語 (Nahuatl) 「中介之地」為喻，闡釋邊界文化混血、多元、差異的無限可能；九四年亞地阿加 (Alfred Arteaga) 的邊

界研究選集《他舌》(*An Other Tongue: Nat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Linguistic Borderlands*)；九五年加提耶瑞-瓊斯 (Carl Scott Gutierrez-Jones) 主述奇哥娜文化生產的《再思邊境》(*Rethinking the Borderlands*)；九六年潘紐 (Guillermo Gómez Peña) 文類含混的《新世界邊界》(*The New World Border*)；九七年沙笛巴再出版新書《邊界要件》(*Border Matters: Remapping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以邊界對抗主流，以遊民 (migrant) 取代移民 (immigrant)，由美利堅 (USA) 轉向美洲 (Americas)，以邊界為新興文化研究的場域。二〇〇〇年沙笛芭胡的《邊界女性主義》(*Feminism on the Border: Chicana Gender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以邊界書寫的性別政治為題，結合種族、階級議題闡釋奇哥娜文化認同。⁸

上述種種文化研究 (邊界) 論述，種族與性別議題著墨深刻，階級意識主述者則寥寥可數，卡德龍與沙笛巴合編《邊境評論》堪稱一例。階級意識啟動奇哥諾國族運動，勞工為運動先驅是歷史不可抹滅的事實，勞工階級意識則為墨美「反對文化」之精髓。派特門 (Jan Pettman) 借用霍爾與齊洛伊 (Paul Gilroy) 黑人研究語彙說明墨美族裔同樣具有發展「反對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 的潛能：「有幸制即有抗拒的能量，幸制與抗拒將群體關係政治化 (politicized)，反對文化非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力，而是在特殊歷史地理位置 (locations) 上，所產生對國族、種族主義、性別主義與階級主義系統化幸制的抗爭」(Pettman, 1991: 191)。準此，墨美抗爭文學 (resistance/contestation literature) 應運而生，再現「反對文化」之要義，沙提巴 (Ramón Saldivar) 認為在特殊政治、經濟與種族的壓迫下，墨美人自邊緣發聲，操作如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所稱「多種形式」(many forms) 的「對抗政治與文化」(oppositional politics and cultures)，足以揭露／拆解文化霸權形

⁸ 有關邊界主義／寫之論述，參見梁一萍 (2003) 與黃心雅 (2003a)。

塑過程並予反制 (Saldívar, 1990: 10)。沙提巴援引民歌〈墨德人〉 (“The Mexico-Texan”)，考掘為文化霸權所藏抑的族裔勞動史：「墨德人沒有土地」；「他沒有國家，沒有旗幟；他沒有聲音，唯有勞動的雙手」 (Saldívar, 1990: 11)。一八四八年阿茲特蘭原鄉土地失落，抗爭文學考掘散失族裔歷史由「勞動雙手」寫起，沙提巴稱道：「抗爭文學展現美學及文化生產如何成為被壓抑歷史的意識型態反書與重述」 (Saldívar, 1990: 19)。沙提巴由族群勞工為起點，勞工意識即為抗爭文學的原動力，繼而轉入性別議題，以墨美族裔勞動論述涵蓋性別議題，沙提巴認為勞動分工 (labor division) 將勞動市場生產 (labor market production) 視為男性場域、家務勞動再生產 (housework reproduction) 為女性場域，此乃全然白人中產階級的情境，墨美人篤信天主教，注重家庭倫理，但文化價值與家庭意識卻無法決定女性勞動力的參與，經濟困境與殖民帝國種族主義迫使奇哥娜女性不僅需操持家務更需投入勞動市場，以維持家庭生計。自十九世紀，奇哥娜女性即相繼投入移民農業勞動市場 (migration agricultural labor market)，邊境食物加工廠、家庭僕役、紡織與輕工業或其他服務工業 (Saldívar, 1990: 20-21)。在不同勞動形式中，奇哥娜族裔女性承受職場與工資區隔 (job and wage segregation)，職場裡不僅複製父系家庭與兩性不平等的態勢，沙提巴套用法農 (Frantz Fanon) 之論認為，美國殖民主義之生產體系改變一八四八年後西南部 (the Southwest) 的「物質情境」 (material conditions)，對墨美族裔歷史文化之貶抑持續摧殘族裔未來，族裔女性深受其害 (Saldívar, 1990: 23)。

奇哥娜文學描繪邊境跨文化經驗，由邊緣發聲，結合種族、性別、階級議題，從觀照勞動場域寫起，重書被深藏族裔歷史，足為「抗爭文學」之典範。本文以下即以安莎杜娃《邊境》與卡斯狄洛《如此遠離上帝》為例，說明植根於勞工階級的奇哥娜族裔如何透過書寫揭露美墨邊境「三重壓迫」，安莎杜娃與卡絲狄洛二人一寫土地，再誌勞

動，同樣反書帝國主義，在抗爭文學中啟動促變的原動力。

肆、土地與回歸：安莎杜娃的《邊境》⁹

安莎杜娃在一九九二年的履歷表上自喻為「奇哥娜·德哈（女）那、勞工階級、歹割女性主義詩人、作家兼評論家」，族群創作與差異政治俱是安莎杜娃書寫訴求。在〈致（至）酷異作家〉（“To (o) Queer the Writer—Loca, Escritora y Chicana”）文中，安氏反駁吳爾芙（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之論：「書寫為集體、互助行動，無法在自己的房間完成」（Anzaldúa, 1991: 255）。在〈舌語：給第三世界女作家的一封信〉（“Speaking in Tongues: a Letter to Third World Women Writers”）安氏進而指出吳爾芙「自己房間」對奇哥娜作家而言，是可遇不可求；弱勢族裔女性「在廚房寫、把自己關在浴室裡、在公車上或排隊領救濟金時、工作時、三餐間、半睡半醒、坐在馬桶上也寫」（Anzaldúa, 1983: 170）。奇哥娜女性如同打游擊，且戰且走、不斷遊走，在細瑣空間中持續創作

⁹ 《邊境》一書原預定以詩集形式出版，詩集前附約十頁序言，不意成書兩百頁，其中一百頁即是原始序言抒發而成的自傳散文／邊界論述，開啟邊界研究先河，成為當代文化研究典範，將邊界論述推向高峰，九〇年代因而成為跨疆越界的年代。全書約莫可畫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越界」（“Atravesando Fronteras/Crossing Borders”）為題，雜混詩文、自傳故事（見證）及族群歷史共七篇。首篇〈家鄉在阿茲特蘭〉（“The Homeland, Aztlán/El otro México”）呈現多音含混主體，雜揉族群歷史、家族歷史、土地掠奪及非法偷渡，集體講說故事，為本文文本的主要依據。第一部分自傳詩文論述則為第二部分創作的詩論及理念基礎。第二部分為西、英雙語詩選，以「狂亂的風／風神依耶卡托」（“Un Agitado Viento/Ehécatl, The Wind”）為題，分六品，各具副標題及題詞（epigraph），共三十八首。其中，第二品「失落」（“La Pérdida”）記錄從屬女性日日勞務，以童年紀憶見證白人地主強暴文化，與本文主題最為貼合。《邊境》一書除可視為種族、性別、階級政治交切的奇哥娜抗爭文學代表作外，其泰半篇幅中所處理的奇哥娜同性戀情慾，以對抗種族、父權與異性戀文化霸權勾結的議題也不容漠視，參見黃心雅（2003a）。

(梁一萍, 2003)。奇哥娜書寫的空間流動與其原鄉土地之失落息息相關。《邊境》首章從族裔殖民史寫起, 追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族裔原鄉土地之失, 時間與空間政治交錯, 細數殖民霸權合法化土地掠奪的過程:

西元一八〇〇年, 安格魯非法移民到美國德州 (當時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人數日益增加, 繼而把德克薩斯墨裔趕出他們自己的土地。安格魯帝國式的侵略迫使墨西哥人為了保護德州的土地而發動戰爭。在阿拉模 (Alamo) 一役, 安格魯擊敗墨西哥人不僅使白人此後視墨西哥為懦弱與邪惡的象徵, 也是安格魯合法接收德州的關鍵。一八三六年……德州成為合眾國的一部分。德克薩斯墨裔失去自己的土地, 一夜之間, 他們竟然變成外國人。(Anzaldúa, 1999: 28)

安氏如同書寫歷史教科書, 細載殖民歷史進程, 帝國以戰爭暴力將「非法」合法化, 使「原鄉」變成「異鄉」、「故人」成為「外客」。土地掠奪是殖民主義宰制的第一步, 安莎杜娃以編年史模式重探殖民地界, 將今日美國的「富裕」(rica) 歸結於土地的取得 (Anzaldúa, 1999: 28)。由殖民而致「富裕」的進程有待釐清。

首先, 緊接軍隊大舉入侵並佔領墨西哥, 美國以瓜達魯佩條約劃界, 強迫墨西哥放棄近半的國土, 這一半失去的國土即今美國的德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及加州等地。白人把德州的邊界向下擴張一百英哩, 從原來的內塞斯河擴張到格蘭大河。此後德州南部不再屬於墨西哥國土。這塊土地劃割給美國之後, 使得原本居住於這塊土地上的人不再視墨西哥為家, 墨西哥成為「美國西南部」, 格蘭大河是為自然地界, 人為劃界繼之而興, 一道分割兩國的邊界圍牆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二日修築完成, 將該地原住民族群一分為二, 將伴隨土地一起被征服的十萬墨西哥人劃歸「圍牆的這一邊」。這塊由條約所劃分出來的疆界合法化美帝殖民

掠奪，原該屬於墨西哥人的土地被詐騙殆盡。帝國執正義與教化之名，種族中心論將殖民地野蠻化，帝國成為維護社會文化秩序的形式，擔負執行規訓、救贖與文明化的角色，安氏引述殖民詩學為證，揭露殖民者的迷思：

禁絕德州復成極度荒野
任蠻族踩踏，或受無能的墨西哥
帶來的無知、迷信、脫序、掠奪
籠罩於未開化的黑暗。
這塊充滿前景與成就的土地，
註定屬於英裔美國人。
受他們的法律管轄，
受他們的知識啟蒙，
在他們的努力下進步。
牲畜遍佈無際的牧場，
沃壤為他們孕育豐饒的收成……
英裔美國人的血汗與進取
已拯救了德州的蠻荒。

——威廉華頓 (William H. Wharton) (Anzaldúa, 1999: 29)

安氏認為美國佬把自己關在白色優勢神話的象牙塔內，以政治優勢奪取已在此扎根的印地安人與墨西哥人的土地。原住民在自己的家鄉被放逐，土地與身體貼合，土地的分割以身體破碎為喻：「將我們放逐，就等於除去我們的根、劈開我們的軀體、奪取我們的內臟。我們的根被硬生生地拔起、切斷，就如同被開膛破胸般，失去也脫離了我們的認同與歷史」(Anzaldúa, 1999: 29-30)。

政治支配以物質生產為續，兩者相輔相成，是構築霸權的標準模式。於此，安莎杜娃由「男性」國族論述轉入「女性」的家族歷史：「我祖母失去了牛群／他們偷走了她的土地」(Anzaldúa, 1999: 30)。在美國，於十九世紀中葉為印第安原住民設置保留區的同時，

原住民的牛群全遭屠殺，帝國夾帶資本主義經濟以大量需求改造農業，土地農田是原住民的生活基本框架，卻是資本家最大限度的收入來源，亟欲將其眼中的蠻荒做最大運用，不毛之地成為糧食出口區，「富裕」的是資本主義市場壟斷，卻多了邊境離鄉背井的「勞動貧民」。

美國政府制訂賦捐、法律條令、規章制度，實行政治經濟，然而，安莎杜娃自述，律師拿走祖母土地卻沒付稅，祖先墓地上演礦物開採權的爭奪，一年僅得 12.5 美元，祖先的土地所剩的也只有年值 12.5 美元的礦產權。安氏由國族「大歷史」轉入家族「小敘述」，土地更加分裂，地界更加繁密：「墓地被圍起……被封鎖。標誌上寫著：禁止進入。侵入者會被射殺」(Anzaldúa, 1999: 30)。

對資本主義來說，土地是生產因素，也是商品，其特殊性在於土地不可移動，土地不能再生，以經濟法則而論，則需完成最大利用。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的農業綜合股份有限公司從墨西哥地主手中騙取土地，地主成為勞工，受雇砍伐叢林、灌木、灌溉沙漠。其辛苦工作的土地也曾屬於他們或為其社群公有。白人以耕作機器，命令墨西哥人清除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在小時候，安氏見證土地被清理的一乾二淨、朝向天際的涵管由水源地引水。一九五〇年代，土地被切割成數以千計的矩形及正方形。殖民者帶來科技、工業化改變邊境的生態。安氏自述，隨著灌溉系統的築構，原來乾旱的土地彷彿奇蹟式成為綠洲：「一年三百四十天的成長季節，任何蔬果的種子只要碰到土地即可順勢成長」(Anzaldúa, 1999: 31)。安氏誇大科技效應，嘲諷殖民的科技干預，灌溉水壩的建築正是殖民暴力的體現，摧毀部落自然生態：

白人雇用墨美人剷平灌林、移去樹叢和仙人掌，汲水灌溉沙漠，這塊墨美人流下汗水的土地，曾經屬於他們，大家公用過，如今盎格魯人帶進龐大機器、犁具，讓墨美人自己將土

地自然的綠意清除。……一九五〇年代我看見土地被切割數
千片工整的長方形、正方形……。(Anzaldúa, 1999: 31)

大型科技機具是國家霸權機器的隱喻，部落賴以維生的自然山、川、叢林被泯除，取而代之是人為、工整的地界重劃，土地是生產要素，也是資本家的商品，壟斷「天然專賣品」的資本家，對經濟其他部門進行「勒索」，整座農村是市場、勞動力來源、也是資金的泉源：「父親成了佃農。理歐農場公司借給他生活費和買種子的錢。收成時，我父親必須從收入中撥出百分之四十來償付這些貸款。我們有時會入不敷債，但公司卻是永遠生意興隆。他們有些在蔬菜運輸、家畜拍賣、和軋棉機產業上擁有多數股份」(Anzaldúa, 1999: 31)。

農業改造而外，土地的工業化則是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的另一面向。邊境工廠林立，利用在地勞工生產汽車和電視，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情境 (Anzaldúa, 1999: 31-32)。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殖民公司掠奪數百萬原住民的土地。近來，墨西哥八千萬市民經濟幾乎全仰賴美國市場。墨國政府與資本家與美國跨國公司如美國動力、IT&T 以及杜邦公司形成商業伙伴。墨西哥人口四分之一在工廠工作，其員工多半是女性，女工一天工作八到十二小時，當婦女在工作時小孩多半街頭流浪，成爲一群混血兒幫，如果「家」是資產階級展示財富的場域，邊界勞工成就白人消費文化，己身卻面臨家的崩解，兩者間有無法跨越的鴻溝。

白人資產階級男性與原住民勞動階級奇哥娜的對比，在安莎杜娃所集的小詩〈白翼季節〉(White-wing Season) 中充分體現，奇哥娜農婦以分文代價讓白人在她農地上狩獵，白人資產階級以狩獵爲娛樂，奇哥娜農婦卻需撿拾遺留的獵物餵飽幼兒 (Anzaldúa, 1999: 124-125)。另一〈風吹羽翼〉(Sus Plumas el Viento) 詩裡則追述作者兒時親眼目睹的記憶，白人農場裡的奇哥娜雇工，爲保住工作，

任由雇主強暴，只敢默默冥想有朝一日化為羽翼，逃離勞動階級宿命。安氏所欲強調的正是奇哥娜勞動階級困境：殖民暴力重劃地界，同樣的暴力也一再在奇哥娜女工的身體上重複展演 (Anzaldúa, 1999: 138-41)。

邊界移民潮則是帝國與資本主義共謀宰制的另一夢魘。索幣的貶值及墨西哥對美的倚賴，已造成墨西哥人所稱的「危機」。墨西哥有一半的人口處失業狀態。在美國，一個人能賺到在墨西哥所得的八倍。一九八七年三月間，索幣已貶值為一美元對 1,088 元索幣。越界對許多「另一邊」的墨西哥人而言，是尋求生存的抉擇。每一個墨西哥人的身體裡，存在著一則失落的土地原鄉神話。邊境居民因經濟困境越界謀生，稱此次偷渡／移民工潮的「移返故園」為「沉默的入侵」(Anzaldúa, 1999: 32)。

對墨美族裔而言，遷移有其浪漫的面向，也有現實的困境。墨美族裔有遷移的傳統——「一種長途跋涉的傳統。今日我們正目睹墨西哥民族的遷徙，一個返回歷史的、神話的阿茲蘭的飄泊。這次，旅程是由南往北」(Anzaldúa, 1999: 33)。西元十六世紀，阿茲特克混血族裔隨西班牙征服者南征，在南方住了三個世紀，如今尋覓「福地」之舉其實是回歸原鄉阿茲特蘭的旅程，「回歸」因移民勞工而啟動。唯獨邊界政治使千萬個沒有證件的勞工重返美國西南部原鄉成為偷渡，不斷流徙的墨西哥民族沒有真正的名字，帶著莫大的恐懼。邊境警察藏匿在德州等邊境城鎮的麥當勞後面；在橋下沿著河床設陷阱；身著綠色軍裝的邊境警察用強力電子夜視鏡掃描這些「經濟的流亡者」(Anzaldúa, 1999: 33)；邊境警察將非法墨西哥勞工上銬、鎖進車內、遣送回國。三人中就有一人被捕。有些人一天內重複上演三次遷徙的「儀式」。「福地」之旅只有苦難、傷痛和卑賤的死亡 (Anzaldúa, 1999: 33-34)。

墨美勞工生活在無人跡的邊界，在入罪與溫飽間擺盪、在抗拒

與遣返間拉扯。這些非法偷渡客是美國境內被剝削最多的窮人。墨西哥人沒有綠卡工作是非法的，但是大型農業公司與非法走私業者勾結，不需支付聯邦最低薪資，無須保障勞工健康與居家生計。大農場企業集團和人口走私份子即從這些「汗流浹背」的勞工身上榨取錢財，是墨美勞工勞動力以外的另一「附加價值」。

安莎杜娃一再強調奇哥娜婦女尤其身處危難：走私者常常好幾天不給食物；強暴與賣淫是常有的事；奇哥娜婦女不能要求國家或州的健康與經濟上的救援；拋下孩子又回不了家，擔憂家人，身心俱疲，邊界瘋女時有所聞：「她們因壓力過大而患精神病」(se enferma de los nervios, de alta presion) (Anzaldúa, 1999: 34)。安氏此處由英文轉為地哈那西語，母語的萌現 (emergence) 細緻描繪癡狂的母體，致使與母(國) 土文化得以重新牽連，強化弱勢族裔論述。《邊境》一書由多語文 (multilingualism)、族裔性 (ethnicity) 及跨國性 (transnationalism) 角度打破「惟獨英文」(English only) 的文化霸權，以「英文在加」(English plus) 重劃文化版圖。

安莎杜娃游移 (travel) 於不同語文的書寫策略，如同隨偷渡女工的腳步遊走於多重文化邊緣，其間涉及文本後殖民性的問題，安莎杜娃在書後〈專訪〉中以帶連號的 post-coloniality 來指明其後殖民性為 nos-otras (we-other) 的邊界兩方的交易與翻譯，nos (we) 為霸權殖民者，otras (other) 為被殖民族群，安莎杜娃的文本已是「跨國(文化) 翻譯」(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translation) 的踐履形式，據巴巴 (Homi Bhabha) 的說法，西方殖民母國世界的移民／遊民 (immigrant/migrant) 成為主流社會內部殖民 (internal colonialization) 的對象，但移／遊民所從事的跨國翻譯，暗示了作為少數族裔的後殖民遷徙者，面對不平等的政經、社會、語言、文化、族裔的權力機制，唯有藉母語轉譯／文化翻譯，陳倉暗渡，重建自我，如此一來，被置換或離散的主體方得生機 (Bhabha, 2000)。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符碼的

單純轉換，更是文字所蘊含思維模式的文化置換，《邊境》原文已是翻譯，在多種語言／符碼間—英文為主、西班牙文為次，其中夾雜奇哥娜英文、印第安語、卡絲地蓮 (Castilian) 西文、德墨西文 (Tex-Mex)——置換／交易 (displacement/exchange)，置換／交易則形成一次次的越界，於邊界處出、入，從空間中出走，是以空間政治對抗「惟獨英文」的霸權，產生第三國度 (a third country) (Anzaldúa, 1999: 25, 33)，含混邊界及語言，跳出「我們」(nos) 移向「他者」(otras)。從後殖民角度來看，即是將文化差異轉移至文化翻譯的邊界協商 (border-line negotiations)。《邊境》顛覆文字原本，以文化翻譯模糊邊界，讓「殖民者也帶上了被殖民文化的色彩」(Anzaldúa, 1999: 243)。

安莎杜娃的文化翻譯由奇哥娜勞工生命史位置發聲：「她已經賣了她的家、她的家具，甚至借錢來支付偷渡費用，私娼、賣淫、非法打工。她棲身為僕，一個星期僅賺得十五元，或是在紡織場工作」(Anzaldúa, 1999: 34)。《邊境》首章結束於「非法女勞工、無證件的女人」與殖民、男性、階級暴力搏鬥的無助，通篇以三行一短句的慘烈意象收尾：「這是她的家／細邊的／倒刺鐵絲圍籬」(Anzaldúa, 1999: 35)。安氏勾勒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中的第三女人 (The Third Woman)／他者女性 (Other Woman) 的圖像，以故事 (cuento) 口述見證 (testimonio) 再現「她的故事」(Herstory)。此一意象其實呼應全章開始「邊界女人」的情境：

綿延一千九百五十英哩開敞的傷口
 分割了一個部落、一個文化，
 傷口劃過我全身
 在血肉裡戳進一根根的牆樁
 撕裂我 撕裂我
 撕裂我 撕裂我

這是我的家

這細邊的
倒刺鐵絲網。(Anzaldúa, 1999: 24)

由「我」的家到「她」的家，安氏將「我的身體」與「她的身體」貼合，我的故事與她的故事多音和聲，《邊境》序言中，安氏自謂為「邊界女人」，終其一生跨越地哈那-墨西哥及「種種其他」的邊界，在自己的家鄉被殖民；邊境是「充滿矛盾的區域，仇恨、憤怒、剝削是這塊土地的特色」(Anzaldúa, 1999)。安氏以邊境為「低層、中產與上層階級碰觸的界域」，從階級性下手，再以兩個身體的貼合——「我的」與「她的」——點出邊境女性意識的綿密不斷：邊境是「兩個個體親密縮貼的空間」(the space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shrinks with intimacy)，以族裔女性的前仆後繼經營邊境集體奇哥娜意識。

土地的破碎以身體的撕裂為喻，安莎杜娃以邊境為家：「不舒服，但卻是個家」(not comfortable but home) (“Preface”)；「你在家，卻是個陌生人」(You are at home, a stranger) (Anzaldúa, 1999: 194)，這種獨在「家鄉」為「異客」的「在地鄉愁」是受迫族裔文化的情境，卻也是「促變」的契機。安氏坦承己身如烏龜，背著殼，四處為家 (I am a turtle, wherever I go I carry “home” on my back) (Anzaldúa, 1999: 43)，家被去地域化，家不是地理上固著的定點，而是心理習性，隨身體移動。「家」已不可回，「家」(home) 是漫遊行者的「身體」(body)，而身體開放為「交叉路口」(crossroads)，身體是橫跨邊界「脆弱的橋」(a fragile bridge) (Anzaldúa, 1999: 96)。以「身體」為「家」，隨漫遊開放多元方位，持續變遷 (in a constant state of transition) (Anzaldúa, 1999: 25)，以身體為橋具體再現「此橋謂我背」的「構橋」理念，以女性身體為橫跨美墨邊界格蘭大河 (Rio Grande) 的橋樑，出入邊界，性別、族裔、階級與地理政治交相輝映，呈現「第三女人」的「第三空間」。

從邊境奇哥娜勞工的絕望裡自然也孕育出了一股勇氣，這股勇氣引領著這群未開化但卻性情堅毅的墨西哥人於夜晚時來到河邊聚集：「於此，二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交錯成一個新的疆域，一個美國總統雷根稱為『邊界』的疆域，而在這個漫天烽火的地域裡產生了一個驚世的邊界文化，一個自給自足、自立自強的第三國度」(Anzaldúa, 1999: 33)。安莎杜娃肉身倒臥地圖，橫跨邊界，承受邊界撕裂傷口，控訴帝國主義強暴文化，安氏深切覺析邊界文化現實情境的矛盾與衝突，卻也承受「傷口」，族裔勞工的聚集也成為「回歸」的原動能。

《邊境》首章將「回歸」植根於前殖民時期的族裔歷史。美洲圍壘初期，首批移民穿過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s)，越過美洲大陸，一路向南遷徙。美國境內最早的人類遺跡—奇哥那古老的印地安祖先—是在德州發現的，可追溯至西元前三萬五千年。考古學家在「美國西南部也發現兩萬年前的印地安人營地，印地安人曾經遷徙經過或會定居過美國西南部的阿茲特蘭——一塊屬於蒼鷺的土地、白淨的國度，即是阿茲特克源始的伊甸園」(Anzaldúa, 1999: 26)。西元前一千年，最早科契什民族 (Cochise) 的後代移居至現今的墨西哥和中美洲，成為許多墨西哥人的直系祖先 (美國西南部的科契什文化即是阿茲特克人的原始文化)。¹⁰「阿茲特克人—那華特語意為阿茲特蘭的民族—於西元一一六八年離開了美國西南部」(Anzaldúa, 1999: 26-27)。前殖民時期族裔歷史的追溯重述／重塑族裔遷徙傳統，構築原鄉阿茲特蘭的國族神話 (論述)。二十世紀殖民主義與資

¹⁰ 安氏引查北 (John R. Chávez) 所著《遺失的土地：奇哥那的美國西南意象》(The Lost Land: The Chicano Images of the Southwest)。除阿茲特克人外，位在猶他、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州交界的猶德族 (The Ute)、加州的蓋柏麗若族 (Gabrillino)、亞利桑納州的皮瑪族 (Pima)、新墨西哥州的某個普威洛族部落 (Pueblo)、德州的科曼奇族 (Comanche)、墨西哥索羅那 (Sonora) 的歐帕他族 (Opata)、西納露阿 (Sinaloa) 和都朗哥 (Durango) 的托拉胡瑪拉族 (Tarahumara)、哈力斯哥 (Jalisco) 的惠丘爾族 (Huichol) 原住民也都說猶托阿茲特克語，祖先也是來自科契什民族。

本主義勾結造成邊境勞工的困境，其龐大的族裔遷徙，成為「促變」的因素，以回歸發源地阿茲特蘭論遷徙，則意義非凡：阿茲特蘭原鄉的建構反轉「偷渡」為「回歸」，爭回土地的所有權，即化非法為合法。安莎杜娃從土地說起，回歸作結，揉合歷史與地理政治，就中交切種族、性別、階級意識，以奇哥娜勞工「她」的故事為樞紐。

伍、勞動與結盟：卡絲狄洛《如此遠離上帝》

安莎杜娃寫土地與回歸，卡絲狄洛則誌勞動與結盟。卡絲狄洛的《如此遠離上帝》是奇哥娜抗爭文學佳作已受肯定，¹¹ 其評論多以女性主義為基軸：德兒佳地蘿 (Theresa Delgadillo) 認為混雜阿茲特克與天主教傳統的族裔性靈 (hybrid spirituality) 成功實現奇哥娜女性主義抗爭 (Chicana feminist resistance) (Delgadillo, 1998)；帕拉特 (Kamala Platt) 則論述小說為墨美社群寫實主義代表，從生態女性主義觀點抗爭污染，視「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 為基本人權，是社會經濟正義的根本 (Platt, 1998)；西瑞兒 (Silvio Sirias) 和麥凱瑞 (Richard McGarry) 之作，以性別政治闡釋卡氏小說，以性別政治作為對抗邊境父系霸權的抗爭策略 (Sirias & McGarry, 2000)；藍苻 (Carmela Delia Lanza) 援引胡克斯 (bell hooks) 之論，以「家」為抗爭場域 (site of resistance)，對比阿兒卡特 (Louisa May Alcott) 白人主流文化之家庭小說《小婦人》(Little

¹¹ 卡絲狄洛以寫詩起家，卻以小說著稱。《如此遠離上帝》獲 Carl Sandburg 文學獎，其他有一九六八年 *The Mixquiahual Letters* 獲 The American Book Award；一九九〇年 *Sapogonia*；一九九六年 *Loverboys Stories*；二〇〇〇年 *Peel My Love Like an Onion: A Novel*；散文評論 *Massacre of the Dreamers: Essays on Xicanisma* (Castillo, 1995)，以 *Xicanisma* 為墨美族裔女性主義命名，是足以媲美安莎杜娃「邊境女性主義」之作。

Women)，說明奇哥娜家庭不同於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同時展演性別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劇碼，是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觀察 (Lanza, 1998)；莫門 (Elisabeth Mermann-Jozwiak) 以及拉瑞格司 (Ralph E. Rodriguez) 皆由女性創作著眼，莫門認為卡絲狄洛以後現代主義去中心論為抗爭書寫策略，探討作品的後現代性；拉瑞格司則用 *contestation* 代替 *resistance*，論述卡氏以後現代敘事之語言文字而非以社會革命為抗爭手段 (Mermann-Jozwiak, 2000; Rodriguez, 2000)。

女性主義論述豐沛，但探討卡絲狄洛作品之精髓亟需由族裔與階級意識再加補強，卡絲狄洛於其散文評論集《尋夢者大屠殺》(*Massacre of the Dreamers*) (Castillo, 1995) 書中，明確揭櫫「墨美族裔女性主義」—以卡絲狄洛的語彙來說，即是 *Xicanisma*，雜揉奇哥娜、混血意識 (*Mestiza*) 與西語傳統 (*Hispana/Latina*)，有種族主義與階級主義多種考量，卡氏自謂為「沒有國家的女人」(*countryless woman*)，由己身的生命史說起：「生於低層階級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更糟也許是毫不存在」(Castillo, 1995: 21)。首先，十七歲即加入奇哥諾國族運動的卡氏亟欲找到奇哥娜文化認同：「我非黑非白更不是北美本土原住民……身為混血族裔，終我一生渴望回歸祖先阿茲特蘭的故土」(Castillo, 1995: 21)，如同安莎杜娃一般，其無所歸屬的身世以回歸原鄉明志。「低層階級」同時指陳源自勞工家庭的身世：奇哥娜沒有「美國夢，一個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 (WASP) 的哲學，是構築在邊境第三世界勞動力的剝削上」(Castillo, 1995: 31)。卡氏評論集中〈無國度女人〉(“A Countryless Woman”) 一文，通篇歸結於墨美勞動市場的析辯：「跨國勞動力輸出是我們的宿命，根植於美墨邊境殖民結構……美國消費奇哥娜勞動力卻不支付合理工酬，……女性勞動力商品化，……有時得不到男性家人支援，獨自擔負家養生計」(Castillo, 1995: 36-37)；「多國投資生產創

造廣大獲利，提供全世界消費，跨國生產勞工沒能消費自己生產的商品，他們供不起」(Castillo, 1995: 43)。由土地到勞動力的剝削，卡絲狄洛重複安莎杜娃「邊境」主題，強化現實困境的鋪陳。

小說《如此遠離上帝》場景即在「邊境」：二十五號州際公路一千一百五十四英里處新墨西哥州的湯美 (Tome) 小鎮。小說從單親母親蘇菲亞 (Sofia 西語意指智慧) 及其四個女兒伊絲貝蘭釵 (Esperanza 希望之意)、費 (Fe 信心之意)、佳麗德 (Caridad 慈善之意) 與洛佳 (La Loca Santa 聖瘋女) 的生命史側寫帝國主義戰爭、勞動剝削、勞工疾病、物質主義以至全球殖民、資本主義暴力。德兒佳地蘿 (Theresa Delgadillo) 引述拉古納 (Laguna Pueblo) 原住民作家愛倫 (Paula Gunn Allen) 之論，認為「四」象徵原住民宇宙觀中四方、四時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是部落儀式中女性的力量，主掌化育重生 (Allen, 1992: 276; Delgadillo, 1998: 894)。小說中女性性靈命脈豐沛，固然主導部落重生，但現實殖民結構暴力卻使小說中死亡的意象多過於生，另一奇哥娜著名作家西內蘿 (Sandra Cinero) 說：「這是一部奇哥諾／娜主義的曆書」(參見小說封面)，載記墨美族裔被剝奪、散佚的認同與歷史，如今的「新墨西哥」對墨美人而言，如同殖民初期對來自歐洲的殖民者一樣，是「一塊陌生的土地」且「如此遠離上帝」(Castillo, 1994: 102)。

安莎杜娃由國族土地寫入家族歷史，卡絲狄洛則由女性家族寫起，建構散佚的族裔勞動史；安莎杜娃自傳紀實，卡絲狄洛虛構故事，兩者同樣反書帝國主義，在抗爭文學中啟動促變的原動力。嚴格來說，安莎杜娃寫邊境，強調帝國／資本主義對阿茲特蘭的土地殖民，卡絲狄洛誌勞動，著墨帝國對墨美族裔的身體殖民，土地與身體的貼合，母土即母體，控訴殖民主義種族、階級與性別政治迫害之熾烈。小說《如此遠離上帝》敘述邊界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發展，吞食阿茲特克民族的春天，恍如惡夢一場，第一章反諷地以家庭神蹟肇始，小女兒洛

佳年幼時死而復活，如同取代已然遠離的上帝，守著家族，成為「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家中天使」之喻有其墨美母系文化意涵，墨美人崇拜瓜達盧佩聖母 (la Virgen de Guadalupe)，是聖潔的母親，源自印地安生育豐饒的女神族系，最早的原型即為柯麗瑰／蛇裙女神 (Coatlicue)，是神話中創世女神，太陽、星星與月亮的母親，墨美人視為大地之母，柯麗瑰的另一面相為「同娘親」(Tonantsi) 的慈母形象，掌管生育、健康與穀物，長養族人。卡絲狄洛以母系家庭為故事的主軸，單親母親蘇菲亞 (智慧) 則是核心，是奇哥娜聖潔母親的象徵人物，家的神蹟取代白人／中產階級／父系的宗教救贖，復原族群母系神話，「家中天使」不是維多利亞父系家庭的婦德表徵，而是奇哥娜母親家的守護天使：「她治療其他姊妹承受自社會的創傷和不公義」(Castillo, 1994: 27)。歐美文學正典不斷形塑「家」為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庇護所也是枷鎖，是女性壓迫與抗爭的場域，但就墨美族裔歷史文化來看，「家」不僅是女性壓迫與抗爭的場域，家的性別化分際已然打破，女人為生計持家勞動，邊境勞動階級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家已離散為戰場、工廠與無邊延展的逃逸線：伊絲貝蘭釵死於中東戰爭採訪；費則受職場毒害，因癌致死；佳麗德在街上受凌暴後消失無蹤；從不與外界接觸的洛佳最後卻死於愛滋病。疾病、暴力肆虐較之十五、六世紀殖民初期，尤有過之而無不及。母親的家則成為奇哥娜性靈之所繫，維護族裔命脈於不墜，容後再敘。

實則，安莎杜娃在《邊境》書中述及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藉由疾病之助，得以竟其功。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前，墨西哥和猶加敦半島上有兩千五百萬的印地安人。隨即在西班牙統治後，印地安人僅剩不到七百萬之數。純種印地安人死於麻疹、傷寒、天花等流行疫疾，西元一六五〇年前後，只剩下一百五十萬 (Anzaldúa, 1999: 27)。但卡絲狄洛筆下二十世紀末的苦難不同於前時，卡絲狄洛以自創語彙 Xicanisma，突顯墨美族裔女性困境並非

主流女性主義論述所能涵蓋，其中涉及種族與階級政治面向，不容輕忽，尤其在二十世紀末，跨國企業和高科技產業形構帝國種族主義全然不同的形式與策略，資本主義全球化借帝國機器運作，帝國變遷由早期殖民屠殺暴力轉型為資本主義生產，階級論述益顯關鍵，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形成共犯結構，邊境勞工幾成待宰羔羊。《如此遠離上帝》小說中，費做為邊境勞工的角色，卡絲狄洛則有戲劇性的鋪陳。

首先，環境社會政策的制定挾帶種族主義霸權運作，邊境與原住民住居保留區被描繪為自然荒野，闢劃成高污染工業設置處所也是有毒廢料傾倒區。原住民作家席爾科 (Leslie Marmon Silko) 小說《儀式》(*Ceremony*) 主述印地安保留區內鈾礦開採與原子彈製造的殖民浩劫 (黃心雅, 2003b)。卡絲狄洛小說中，國家環境隔離 (*environmental apartheid*) 政策的危害則在於墨美社群中頻頻設立的跨國高科技工廠，不僅邊境勞動力為資本家便宜購買，轉換成行銷國際的商品利益，社群更成為有毒工業廢料 (氣) 棄置場域，職場安全健康未受保障，費長期暴露在擦拭武器零件的有毒揮發氣體下，死於肺癌。「環境 (不) 正義」(*environmental [in] justice*) 牽涉到複雜的種族、性別、階級政治議題。環境調查顯示，新墨西哥州樂司阿拉模斯 (*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下游二千四百個據點，發現種種化學物質污染：「鏷、鈾、鈾 90、氙、鉛、汞、硝酸塩、氰化物、殺蟲劑以及半世紀來國家武器研究及生產所殘留的有毒氣體」(Platt, 1998: 147)。湯美小鎮距離樂司阿拉模斯國家實驗室僅七十五英哩，正當其衝。因此，卡絲狄洛操作語彙，入城的旅遊指標「奇幻之境」(*Land of Enchantment*) 成為「陷阱之地」(*Land of Entrapment*)，旅行家凝視下的異國情調 (*exoticism*) 其實是「在地客」(在自己家鄉被放逐) 的現實困境，墨美族人成為自己家鄉人的陌生人：

大部分她身邊的人也不了解 [空氣中]慢慢謀殺他們的物質是什麼，甚或他們根本不去思考，想了也無濟於事，日子總要過，雖然原野上的牛死了，羊病了，人們冬天清晨醒來發現下了黑雨，小鳥飛行間掉地而亡，冰雹斗大……「奇幻之境」已成「陷阱之地」。(Castillo, 1994: 172)¹²

小說刻畫種族落差以外，更有性別的差異，形塑特殊的邊境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科技帶來「去技術化」(deskilling) 效果，女性勞工受害尤深，邊境弱勢族群缺乏工會保護，且資方將生產過程「去技術化」後，運用種族、性別分工原則，實行就業隔離 (job segregation)，以廉價工資購得邊境女性勞動力。小說中費為高科技產業「頂點國際公司」(ACME International) 工作賺取工資，為的是實現主流文化吹誇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將貧窮破敗的家轉化為中產階級物質主義的房子：「自動洗碗機、微波爐、食物處理機及 VCR」(Castillo, 1994: 171)。科技的發展改變家務工作再生產的模式，女性期待家務自動化節省下來的時間投入職場，不意跨國企業剝削，使費的梦想兩頭落空，「貧窮」女性化，卡氏如安莎杜娃《邊境》中所書，說明墨美女性勞動力生產汽車和電視，家中卻供不起這些大眾消費家用品。跨國公司支付的只是與勞動力再生產價值相映的價碼，而非與勞動生產品對應的等價，種族與性別差異使邊境「國際公司」利益龐大，而墨美女性勞工承受無法跨越的「階級區隔」(class segregation) 夢魘。

就性別面向來說，小說對墨美女性勞動身體鋪陳最為深刻。費的聲帶因一次情傷嘶喊而損毀，失聲的費由銀行離職，轉入「頂點國際公司」，跨國資本與國防部契約結盟，製造中東戰爭所需武器，共犯結構以費為代罪羔羊，費因使用有毒鎔劑遭 FBI 約談，其失聲

¹² 此處為卡氏語言運用諷刺之處，訪談中，卡氏提出諷刺之必要，尤其對生在環境危害與經濟困頓中的墨美人而言，「生活是充滿矛盾又對立的」(Saeta, 1997: 136)。

具象徵意涵。對帝國殖民與資本主義的共犯結構而言，費的失聲即是「噤聲」(silenced)，帝國、資本、父系霸權所形塑的「宰制矩陣」在 FBI 的約談中充分體現，費則毫無選擇地「沈默」(silence) 以對。

更進者，小說中的女性身體如同跨國工業的實驗場，「頂點」主管強調，所用鎔劑只是「醚」(esther)，費等邊境女工以「身」試「劑」，跨國資本與殖民毒性以勞工身體症狀展演：「嘔吐、頭疼日復一日加劇」(Castillo, 1994: 178)。費發現自己流產，和其他女工一樣無法生育，「醚」劑之說啓人疑竇，結構性暴力透過勞動生產 (production) 剝奪女工生育 (reproduction) 功能，公共衛生護士此刻扮演關鍵角色，西醫等同科學的客觀性將醫學去政治化 (de-politicized)，取得公正、客觀科學的權威，以止痛劑哄騙墨美女工，謊稱流產是更年期的先兆，與工廠中的化學藥品無關 (Castillo, 1994: 182)。帝國殖民霸權與醫學、疾病與帝國科技的關聯是小說極力鋪陳的結構性宰制，交雜種族、性別與階級政治運作，《如此遠離上帝》強調「帝國科技」(imp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土地掠奪」(land usurpation) 與「環境區隔」(environmental segregation) 和邊境女工疾病的重大關聯，殖民醫學則以理性、客觀之名為帝國擴張開罪，透過科學包裝與政治操作轉化為對墨美女工身體的規訓，踐行種族、性別與階級的箝制。

如果如瑞琪 (Adrienne Rich) 所言，女性以身體政治在歷史文化中找尋自我定位，此即「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 (Rich, 1985)，《如此遠離上帝》小說中記述種族、性別、階級主義交叉運作，以女工身體為實驗場，女體不孕即是對女性剝權 (disempowering) 的最佳隱喻。如果二十世紀初西方醫學公共衛生政策曾以多產為疾病 (fertility as disease)，實行生育計畫 (birth control)，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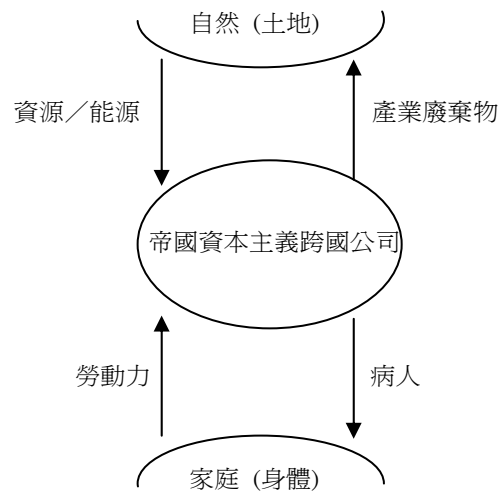
¹³ 參照 Gordon (1978)；有關殖民主義假醫學之名行宰制之實，參見 Fanon (1978)。

以文明之名，透過箝制女性身體，貫徹殖民地人口政策，二十世紀末，墨美女工之不孕是殖民和資本主義共犯結構暴力的結果。墨美女性身體成爲種族、性別和資本主義權力運作的場域，卡絲狄洛的小說文本不僅如帕拉特 (Kamala Platt) 所言，是「社會檔案」(Platt, 1998: 143)，更是透過勞工生命史所形構的帝國資本主義殖民檔案。

卡絲狄洛寫邊境帝國／資本主義之種族、階級與性別政治迫害，以女性身體爲交切的文本，邊境跨國工業經濟操作的不僅是意識型態，更是勞動策略，邊境工作「女性化」，殖民資本主義運用種族、性別分工原則，實行就業隔離，以廉價工資購得邊境墨美族裔女性勞動力。邊境女性勞工被殖民身體爲帝國殖民主義之「再現」(representation)，是傅柯 (Michael Foucault) 所謂「馴服的身體」(docile body)，成爲二十世紀末墨美邊境「病理」(pathology) 的淵藪。費的「身體」是帝國殖民權力關係的「銘刻」(inscription)，女性身體所寓含的被殖民文化意涵，不容漠視。卡絲狄洛描繪邊境文化，由種族、性別、階級的邊緣發聲，從觀照勞動場域寫起，重書被噤聲的奇哥娜族裔歷史。

卡絲狄洛強調殖民與經濟的需求造成邊境疾病蔓延，殖民主義造就生態暴力與自然危機，導致疾病，環境社會政策的制定挾帶種族主義，邊境與原住民住居保留區被描繪爲自然「荒野」，遂行「環境區隔」，造成「環境不正義」，疾病遂牽涉複雜的種族／環境隔離議題，美國國家實驗室周邊種種化學物質污染以及半世紀來國家放射性礦物開採、武器研究及生產所殘留的有毒的邊境生態即是卡絲狄洛創作的素材。國家環境隔離政策與「荒野」概念息息相關，美國開國殖民神話塑造西部爲「少數」印第安人居住的「荒野」(wilderness)，哥倫布發現之旅後五百年的美國墾「荒」史可說是原住民族、文化與歷史的「大屠殺」(holocaust) 災難史。帝國主義殖民檔案與自然、環境、疾病關聯，可以下圖昭示，帝國殖民主義

利用原住民勞動力，於自然資源予取予求，將廢棄毒物倒棄原住民住居保留區所劃歸的自然「荒野」，即是原住民社群的病源：



如上圖所示，邊境原住民的土地與身體成爲帝國資本主義跨國企業充分運用的資本，鞏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與帝國殖民擴張，土地與身體貼合，生態的破壞與身體的疾病具是帝國殖民與資本主義的「銘刻」。

然而，安莎杜娃由土地寫回歸，卡絲狄洛則聚焦墨美女性勞動的身體，卡絲狄洛由勞動轉入結盟，墨美女性勞動的身體不僅是帝國殖民與資本主義的「銘刻」，身體也是「抗拒場域」(site of resistance)、「促變因子」(agency for change)，承載了奇哥娜勞動族裔被噤聲的歷史與記憶，是卡絲狄洛的「反書帝國」的動能，卡氏跳脫「殖民身體」的邊境困境，以「去殖民身體」(de-colonizing the body) 爲標的，視身體爲阿茲特克族裔歷史、記憶的再現，更是反種族、性別、階級霸權抗爭的場域，以阿茲特克族裔結盟爲小說收尾。

具體來說，費的身體與階級不僅是揭露種族、性別與階級「主宰與屈從基本關係」的媒介，卻也是「促變的原動力」，費因職工染病而死，激發小說結束時的社群大遊行，極具宗教性更有政治性，天主教性靈象徵的聖母像被職場災難中已逝親人的相片所取代，邊境女工置換瑪麗亞成為部落聖者：「蘇菲亞捧著費的新娘照，其他些人也像蘇菲亞一樣將死於長期暴露於毒氣的親人遺照掛在項前」(Castillo, 1994: 241)。小說結束的遊行是一幕充滿戲劇性的部族儀式：

這次的遊行不同過往——聚集了二百位群眾……女歌手加入遊行行列，以吉他伴奏，吟唱她自己的歌謠，這些歌謠一點也不具宗教性質，是有關勞工與罷工婦女的種種事，卻如聖詩一般撼動人心，群眾嘆息、啜泣，有些人隨著歌謠一同吟唱，眼睛直視天際。(Castillo, 1994: 241)

遊行中並演出耶穌背負十字架的行動劇，耶穌三度傾倒，扶持他的不是聖母瑪麗亞，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原住民女性及與日遽增的失業勞工，每回傾倒即是一次原住民的發聲與控訴，如同母親訓斥子息，墨美人控訴土地如同身體因工廠毒性廢料而乾涸「無能」(Castillo, 1994: 242)；「食物不足」「海洋雨林生物」遭受殘害(Castillo, 1994: 242)；兒童在「負載疾病」(disease-ridden) 的海溝戲耍(Castillo, 1994: 243)；核能電廠如同巨大地雷威脅「原住民居住地及祖靈的家」(Castillo, 1994: 243)；殺蟲劑毒害土地；採果懷孕婦女胎死腹中(Castillo, 1994: 243)：

耶穌倒下，而遍地俱是因工廠裡有毒廢料暴露垂死的人們。耶穌遇上他的母親，三個來自那柏荷(Navajo)的原住民女人訴說著印第安保留區鈾廢料污染——「孩子們生下來頭部傷殘，因癌致死」。其中一位懷抱著嬰孩的婦女向群眾訴說：「我們聽說環境生態學家關切他處的環境破壞，我們就生活

在乾涸的土地上呀！我們也關心拯救鯨魚和雨林，我們的族人知道萬物相生相繫的道理，這是我們對大地之母與後代子孫的責任。但我們族人身為萬物之靈卻被排出在生態體系之外，如那些垂死的鯨豚與飛鷹，我們正設法拯救自己……。
(Castillo, 1994: 242)

耶穌又再次倒下，交織著墨美族人的血淚，繼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邊境災難控訴，卡絲狄洛如同發表生態演說，從邊緣發聲，歷歷舉證，從墨美勞動女性的生命經驗，開展串連性別、階級、種族議題，由物質經驗著眼，面對奇哥娜女性的困境，推展成自然、生態、人類、萬物的終極關懷，以抗拮帝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全球災難相生相息，疾病因帝國與資本主義共犯而循環散佈，反諷地操作「全球」一統。墨美族人誓言將核子輻射廢料趕出家園，即是因「勞災」而觸動的部族反思，勞工女性的生命史啟動社群變遷機制，蘇菲亞在小說最後創立日後全球知名的慈善生態組織「殉道者與聖徒的母親」(Mothers of Martyrs and Saints; M.O.M.A.S)，取代跨國資本與殖民，為「全球化」挹注族裔新解，成為阿茲特蘭聖潔母親的代表，是阿茲特克族崇仰之瓜達盧佩聖母的再現，取代遠離的上帝，守護族裔的土地、子孫與精神命脈。

陸、結論

墨美民族詩人帕瑞得司 (Américo Paredes) 有「廣大墨西哥」(Greater Mexico) 之說，¹⁴ 墨西哥實有二解：一為墨西哥共和國所指涉的國家領土／政治實體；「另」一個則是墨美邊境族裔的生活／生命現實，墨美族裔特殊的地理政經經驗 (geopolitical experience)，形塑「邊境」(frontera)，面對不平等的政經、社會、語言、

¹⁴ 有關「廣大墨西哥」之論，參照 Platt (1998: 155, n. 3)

文化、族裔、性別、階級的權力操作，在多種文化間的遊移、協商，陳倉暗渡，重建自我，以求得被置換或離散的主體的生機，此即安莎杜娃所稱「另一個墨西哥」的生命經驗，墨美族裔意識根植於阿茲特蘭原鄉的土地記憶，土地記憶因勞動創傷而相連，承受帝國殖民與資本主義剝削的農工／勞工成爲啓動土地記憶的促變原動力，墨美族人體悟全球勞動少數族裔結盟的迫切，以行動提出政治訴求。

本論文整合後馬克斯、後殖民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關懷，形構種族、性別、階級議題交切的論述基模，以安莎杜娃與卡絲狄洛的文本爲例，探討奇哥娜族裔特殊的種族、性／別與階級受剝削的歷史與生命經驗，質詰文化論述議題單一化的合法性，以奇哥娜歷史文化經驗跨越族裔、性別、階級議題單一類檔，以其認同政治重新導引文化論述，以族裔生命經驗跨越主流意識型態，進而發展文化論述統整的覺知 (holistic awareness)。安莎杜娃與摩拉格所謂的「造橋」政治，極具深意：「行旅人啊！我們無路可走，就造座橋吧！」(Moraga & Anzaldúa, 1983)，「橋」的意識串連奇哥娜種族、性別與階級性爲一體 (totality)；「橋」的意識也串連少數民族與其他受壓迫性別與階級爲聯盟。奇哥娜「反抗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抗爭文學」輸送對抗霸權的族群意識。安莎杜娃與卡絲狄洛書寫土地記憶與勞動生活現實，勞動女性經驗成爲知識生產泉源，奇哥娜文化政治意識，如撒格魯 (D. A. Segura) 與伯瑞格拉 (B. M. Pesquera) 所說，即是「透視、再造世界秩序的明鏡」(Anzaldúa, 1999: 9)。

參考文獻

- 梁一萍 (2003)。〈邊界敘事：奇哥娜作家邊界書寫〉，簡瑛瑛 (編)，《女性心／靈之旅》，頁 205-232。台北：女書文化。
- 黃心雅 (2003a)。〈同志論述的奇哥娜想像：安莎杜娃的「新美斯媞莎酷兒」〉，《中外文學》，32, 3: 35-62。
- 黃心雅 (2003b)。〈美洲原住民女性書寫中的族群醫療：鄂翠曲、席爾柯與安莎杜娃作品裡的女性醫學〉，《中外文學》，31, 10: 147-192。
- 傅偉勳 (1987)。〈後馬克斯主義與新馬克斯主義 (上)：當代左派思潮的評析〉，《中國論壇》，293: 47-64。
- Allen, P. G. (1992).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Boston: Beacon.
- Alarcón, N. (1996). Anzaldúa's *Frontera*: Inscribing genetics. In S. Lavie & T. Swedenburg (Eds.), *Displacement, diaspora, and geographies of identity* (pp. 41-5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mariglio, J. L., Resnick, S. A., & Wolff, R. D. (1988). Class, power, and culture. In L. Grossberg & C. Nelson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487-502).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Anzaldúa, G. (1983). Speaking in tongues: A Letter to third world writers. In C. Moraga & G.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pp. 165-174).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 Anzaldúa, G. (Ed.). (1990). *Making face, making soul: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feminists of colo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Foundation Books.
- Anzaldúa, G. (1991). To (o) queer the writer—loca, escritora y chicana. In B. Warland (Ed.), *Inversions: Writing by dykes, queers & lesbians* (pp. 249-260). Vancouver, Canada: Press Gang Publisher.
- Anzaldúa, G. (1999).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Bhabha, H. K. (2000). Interrogating identity: The post colonial prerogative. In P. du Gay, J. Evans, & P. Redman (Eds.),

- Identity: A reader* (pp. 94-101). London: SAGE.
- Belkhir, J. (1994). The 'failure' and revival of Marxism on race, gender & class issues. *Race, Sex & Class*, 2, 1: 79-107.
- Belkhir, J. (1997). Race, gender, and class definition. In C. Grant & G. Ladson-Billings (Eds.), *Dictionary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hoenix, AZ: Oryx Press.
- Belkhir, J., Vanfossen, B., & Berry, K. (Eds.). (1995).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 An interdisciplinary bibliography*. Towson, MD: The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Women, Towson State University.
- Blea, I. I. (1992).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In I. I. Blea (Ed.), *La chicana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pp. 117-130). Westport, CT: Praeger.
- Castillo, A. (1994). *So far from god*. New York: First Plume Printing.
- Castillo, A. (1995). *Massacre of the dreamers: Essays on xicanisma*. New York: First Plume Printing.
- Chabram-Dernersesian, A. (1999). Introduction: Chicana/o latina/o cultural studies: Transnation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movements. Special issue of *Cultural Studies*, 13, 2: 173-194.
- Collins, P. H. (1993). Toward a new vision: Race, class and gender as categories of analysis and connection. *Race, Sex & Class*, 1, 1: 25-45.
- Collins, P. H., & Anderson, M. L. (1995).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Córdova, T., & Cardenas, G. (Eds.). (1997). *Chicana voices: Intersections of class, race, and gender*.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Davis, A. Y. (1981).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Deleuze, G. & Feliz, G.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lgado, T. (1998). Forms of Chicana feminist resistance: Hy-

- brid spirituality in Ana Castillo's *So far from God*.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4, 4: 888-916.
- Fanon, F. (1978). Medicine and colonialism. In J. Ehrenreich (Ed.), *The cultural crisis of modern medicine* (pp. 229-151).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owlkes, D. L. (1997). Moving from feminist identity politics to coalition politics through a feminist materialist standpoint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Gloria Anzaldúa's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Hypatia*, 12, 2: 105-125.
- Gimenez, M. E. (2001). Marxism and class, gender and race: Rethinking the trilogy. *Race, Gender & Class*, 8, 2: 23-33.
- Glucksmann, M. (2002). Gender and the world of work today. Keynote speech to Symposium on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 Gonzales, M. G. (1999). The chicano movement: 1965-75. *Mixicanos: A history of mex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91-222).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L. (1978). The politics of birth control, 1920-1940: the impact of professionals. In J. Ehrenreich (Ed.), *The cultural crisis of modern medicine* (pp. 144-184).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Hall, S. (1997).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P. Mongia (Ed.),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 110-121). London: Arnold.
- Lanza, C. D. (1998). Hearing the voices: Women and home and Ana in Castillo's *So far from God*.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3, 1: 65-79.
- Libretti, T. (1998). Rethinking class from a Chicana perspective: Identity and otherness in Chicana literature and theory. In S. K. Stanley (Ed.), *Other sisterhoods: Literary theory and U.S. women of color* (pp. 200-227).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Laren, P. (1999). White terror and oppositional agency: Towards a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In D. T. Goldberg (Ed.),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pp. 46-75).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Mermann-Jozwiak, E. (2000). Grito desde la frontera: Ana Castillo, Sandra Cisneros, and postmodernism.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5, 2: 101-118.
- Mirandé, A., & Enríquez, E. (1979). *La chica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hanty, C. T. (1991). Introduction—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C. T. Mohanty, A. Russo, &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pp. 1-50).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ohanty, C. T. (2003).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raga, C. (1983). *Loving in the war years: Lo que nunca pasó por sus labio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Moraga, C., & Anzaldúa, G. (Eds.) (1983).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 Mouffe, C. (1988).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 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L. Grossberg & C. Nelson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89-101).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ouffe, C., & Laclau, E. (1994). 《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陳璋津譯)。台北：遠流。
- NLCC Educational Media. (1996). *Chicano! History of the Mexican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Video]. Los Angeles: Author.
- Pettman, J. (1991). Racism, sexism and sociology. In G. Bottomley, M. de Lepervanche, & J. Martin (Eds.), *Intersexions: Gender/class/culture/ethnicity*.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Phelan, S. (1994). *Getting specific: Postmodern lesbian poli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latt, K. (1998). Ecocritical Chicana literature: Ana Castillo's virtual realism. In G. Gaard & P.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pp. 139-157).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odriguez, R. E. (2000). *Chicana/o fiction from resistance to contestation: The role of creation in Ana Castillo's So Far God*.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5, 2: 63-82.
- Rich, A. (1985). 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 In M. Diaz-Diocarets & I. Zavala (Eds.), *Women, feminist identity and society in the 1980's* (pp. 7-2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aeta, E. (1997). A MELUS interview: Ana Castillo.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3, 3: 133-150.
- Saldívar-Hull, S. (2000). *Feminism on the border: Chicana gender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Saldívar, R. (1990). *Chicano narrative: The dialectics of difference*.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egura, D. A. (1990). Beyond indifference and antipathy: The Chicana movement and Chicana feminist discourse. *Aztlan: A Journal of Chicano Studies*, 19, 2: 69-92.
- Segura, D. A. (1991). Ambivalence or continuity?: Motherhood and employment among Chicanas and Mexican immigrant women workers. *Aztlan: A Journal of Chicano Studies*, 20, 1/2: 119-150.
- Segura, D. A., & Pesquera, B. M. (1999). Chicana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Renegotiating culture, class, and gender with oppositional practices. *Aztlan: A Journal of Chicano Studies*, 24, 1: 5-32.
- Shiva, V. (1989).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 Sirias, S., & McGarry, R. G. (2000). Rebellion and tradition in Ana Castillo's *So Far God* and Sylvia López-Medina's *Cantora*.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5, 2: 83-100.
-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L. Grossberg & C. Nelson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rinh, M. T.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Chicana, Border, and Class—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Rac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Mexican-American Women's Writings

Hsinya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ly repressed Chicana voices in term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class, race, and gender. Drawing upon Chica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general, and Gloria Anzaldúa's *Borderlands/La Frontera* (1999) and Ana Castillo's *So Far From God* (1994) in particular, it aims to postulate the existence of a matrix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which is shaped by the interlocking system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The use of Mexican-American borderland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s intended as a corrective to theories which, presumably, reflect only the ideology of the powerful. By emphasizing the down-to-earth practicality of Chicana experience, this study structures a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material life and eventually configures a totalizing blueprint of colonialism, gender, and class to chart the cartography of Chicana struggles.

Key Words: border,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lass, intersection, totalizing view